



馬克斯·韋伯“官僚制”理論探析

譚 融

摘 要：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研究源于19世紀以來歐洲理論家的政治與行政思想。他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從理性主義出發建構其“理想官僚制”的理論模型。韋伯的研究涉獵多個領域，思想中充滿深刻的宗教、文化與政治內涵。儘管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受到來自諸方面的質疑，然而迄今為止，尚無人能夠超過他有關官僚制理論的思考，他的“理想官僚制”理論依然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改革發展政府行政系統的重要理論基礎。

關鍵詞：馬克斯·韋伯；理想官僚制；理性主義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是西方國家最具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也是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他一生致力於考察世界諸種宗教的經濟倫理觀，試圖從比較的角度，探討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通過對中國和印度宗教、古代猶太教以及伊斯蘭教的研究，提出“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倫理精神對於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韋伯，1987：中譯本前言第1頁)的觀點。馬克斯·韋伯構建了“官僚制”的理論模型，他對“官僚制”的理論闡述，主要體現於《重組的德意志中的議會和政府》(1918)和《社會與經濟組織理論》(1921)兩部著作中^①。儘管馬克斯·韋伯對“官僚制”的解釋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與其他研究官僚制理論的學者相比，他對“官僚制”概念的解釋更為清晰，其理論研究也更加深刻和具有內在一致性。

本文將從馬克斯·韋伯“官僚制”理論的來源和研究方法、其“官僚制”理論的理性主義思想內涵及宗教、文化、政治觀以及對其“官僚制”理論的評價幾個方面對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加以探討。

一、馬克斯·韋伯“官僚制”理論的來源

英國學者馬丁·阿爾布羅(Martin Albrow)認為，馬克斯·韋伯“官僚制”理論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德國的行政理論。在德國相當長的历史時期，行政學並非一個獨立學科，而是融於法學中。韋伯早年攻讀法律學並擔任律師，因此熟知作為正規法學課程組成部分的德國行政理論，他對理想官僚制類型的大量論述反映了此種影響。韋伯在其論述中將君主行政與合議制行政加以比較，評價其優劣，將國家行政與效率掛鉤等論述，反映了德國早期公共行政研究的内容。

^① 馬克斯·韋伯的《重組的德意志中的議會和政府》(1918)一書較晚才譯成英文，因此常常為人們所忽略。而《社會與經濟組織理論》(1921)一書則是在他去世後才出版的著作。

阿尔布罗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犹太裔德国人卡尔·H. 马克思(Karl H. Marx)的思想对韦伯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马克思对韦伯的影响并不是关于官僚制的论述,而是关于人的异化的一般论题。对这一理论,韦伯在其理性化的理论中有所推进(阿尔布罗,1990:40)。

19世纪德国经济社会史学者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关于行政组织发展进程的研究,也是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的来源之一。19世纪90年代,施莫勒应邀编纂了《普鲁士文件汇编》(1894),这是一系列有关普鲁士行政制度史的文件汇集。施莫勒为之写了序言,同年还做了有关德国官员体制的讲演,被视为德国现代公共行政兴起的卓越阐释。施莫勒认为,社会由领袖、职事人员和群众三部分组成,社会发展依赖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不断分化;国家间的结构差别源于各国中这三者重要性的变异。施莫勒指出,官僚制的特征即地位与薪金的等级制以及在自由契约基础上人们为行政目标效力等,认为“官位体系,在各个时期的某些特定的国家中,完成了伟大的、确实是无可比拟的成就;即使在它尚未达到无与抗衡的权威地位的地方,它也已经成了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诚然,他也承认,“必须时时保持警惕,以保证官员的高度素质,防止官僚制的危险”,并提出官僚制“由正规行政过程中的病态性偏失构成”(阿尔布罗,1990:41-42)的看法。

在上述问题上,韦伯继承了施莫勒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重新建构了官僚制的理论框架,为官僚制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力图通过把官僚制等同于现代官员体制而使这一概念中性化,并且提出了控制官僚系统这一本质问题。反映出韦伯对现代行政机构发展的深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欣赏它,确信它是智力的成就,它的发展不可抗拒;另一方面,他感到忧虑,认为它在侵害着个人和民族的优良性格。

此外,著名的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①的官僚制理论,成为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又一重要来源。莫斯卡和米歇尔斯的理论中都涉及官僚制与民主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米歇尔斯。他一方面在其理论阐述中试图揭示官僚制与民主制两者的不相容;另一方面,由于米歇尔斯不想参与反对官员体制弊端的夸夸其谈,在论述中采用了将官僚制视为行政官员群体的中立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证明权力集中的不可避免。此种理论阐述对马克斯·韦伯有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在其官僚制理论阐述中需要米歇尔斯所采用的“中性”的“官僚制”概念,以致力于他客观社会科学的研究。然而,当他经过理论演绎提出“理性”官僚制和探讨“官僚制”的现代性时,事实上他无法保持此种“客观”“中立”,也无法回避民主问题。恰恰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概念,澄清了“官僚制”的实质性内涵,并采用更加清晰、简洁的方式来论及这一问题。

二、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理性主义思想内涵

马克斯·韦伯在其“官僚制”问题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并提出经济生活中“理性”的主题。他考察资本主义的起因、表现形式和作用,审视它所具有的“革命性的力量”(克斯勒,2000:88)。考察农业生产领域里资本主义逐渐生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心理和伦理方面的影响,以及诸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资本主义演进的研究中,韦伯区分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最好是从这样的角度,即把它作为理性主义发展之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能够从基于生活基本问题之上的理性条件中推演出来——的角度来理解”,提出愈是理性就愈是与大众的要求和大众需求的回应紧密相联系的看法。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主义发展史所显示的事实是,在千姿百态的生活当中,理性主义的发展轨迹与各种生活的发展轨迹并非是相应平行的。……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覆盖了不同事物的全部世界。我们的任务将是找出理性思想这一特殊形式是谁之子,天职感召和天职感召之工作奉献的观念是从谁那里滋生出来的。……这种意识理念,曾经是,并且仍旧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因素之一。”这种特征使新教的生活观念“有助于一种理性

^①加埃塔诺·莫斯卡(1858—1941):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以发展精英主义理论和政治阶级学说而闻名。罗伯特·米歇尔斯(1876—1936):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提出“寡头统治铁律”这一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莫斯卡、米歇尔斯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又被称为“精英民主理论家”。

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克斯勒,2000:95-96,105)。

韦伯在比较研究和探讨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缺乏一种适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市民意识,缺乏一种“适于资本主义非个人理性‘企业’发展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基础”。他认为,在中国,作为俸禄体系的一个结果,“通过财富的政治性积累,已经造成了一个土地权贵阶层,他们占租了土地,然而这种不稳定的特权贵族既无封建的业务资产阶级的印记,他们仅汲汲于官场,进行纯政治性的冒险投机……一种内部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的资本主义盛行起来了。”(Gerth,1964:85-86)韦伯认为,与氏族观念紧密联结的世袭国家的结构,“根源于中国式伦理的观念态度和官僚阶层及仕途追求者的特质”(Gerth,1964:104)。韦伯将儒教视为一种“凡俗人的内在入世的德性”,所谓“入世”,即“适应这个世界的秩序要求和习俗规定”,最终是适应“一个巨大的政治准则礼法和社会礼仪秩序。”在此种伦理目标下,人们所受到的灌输和教诲是:“不服从比缺乏思想更糟糕”。在此种“官僚政治”下,“如果没有有影响的地位,无论品行如何,一个人也终将无所成就。因此,‘在上者’应求的是位,而不是利”。此种特质“适应于官本位的自我保护利益”(Gerth,1964:152,161,143)。

此外,韦伯认为,中国还缺少一种重要的因素,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计算”法则。在中国,尽管有着精致的商业和一种极实在的“物质主义”,却没有演化出“理性的大规模有条理的商业概念”。而理性的法律结构和管理结构是重要的应计入的因素。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还要求可计量的劳动技术工具、可计量的法律系统和根据正式法律形式加以管理。没有这些,冒险投机的资本主义、投机商的资本主义以及所有政治决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虽然有可能出现,但理性的、有着固定的资本和一定计量的私人经济企业则不可能出现(克斯勒,2000:168-169)。而此种“理性的概念”,“这种系统严密的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学来说,却恰是必不可少的”(韦伯,1987:5)。韦伯说:“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此种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是“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它表明,“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韦伯,1987:13-14)。

无论如何,在韦伯看来,在中国从未有过西方意义那样的“资本家伦理”的演进,其生活取向显现为西方类型的自然法系发展的缺乏和相应而来的律师事务的缺乏。结果是,没有出现与现代法律体系相关的思想和哲学的逻辑及法德逻辑。这些因素阻止了中国城市的发展,阻止了理性的、有可量度功能的行政和司法审判系统的发展,而这两者都是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此种政府管理形式的“非理性”阻止着“理性企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基础的出现(Gerth,1964:104),结果是“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艺术实践,没有理性的思想、法学、医学、自然科学或技术学。既没有神权,也没有人权,能够与这种官僚政治抗争”。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这里没有其他特殊的理性主义的现代因素,能够站出来在那里,或者与官僚政治竞争,或者支持之。”(Gerth,1964:150f)而“新教伦理和禁欲主义派别的伟大成就,则是打破了氏族桎梏的羁绊。这些宗教建立了优越的信仰团体,以及一个与家族相对的共同生活方式伦理”。此种情况表明,恰恰是缺乏“市民和相关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演进这一点,使儒教与新教—基督教经济精神有了显著的区别(Gerth,1964:237-238)。

总之,“理性化”是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研究提出的一个具有现代性范畴的概念,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西方自然法学说和宗教发展的结果。韦伯在研究中归纳出工具理性型、价值理性型、情感型和传统型等不同类型的,力图探究为什么只有西方产生出特殊的“理性”文化?为什么只有现代西欧才发展起“理性的”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理性的”官僚式政府组织?为什么欧洲以外的世界、尤其是亚洲没有出现类似的“理性化”过程,而是存在一种更为古老和不同性质的文化?理性主义的起因、结构、作用和影响,成为韦伯官僚制理论研究的核心。

三、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宗教、文化、政治观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思想源于他对新教的理解。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改革有着广泛的文化影响”,“其结果常常远离了甚至相反于改革者自己想要得到的那种结果。”(克斯勒,2000:97)他在考察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后提出,“资本主义来源于宗教意识的某种变化,这种宗教意识参与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过程”,“最终创造出资本主义”(福根,2001:93)。他将教会视为一种社会组织,提出“一个教会就是一种合作组织”(Weber,1948:305),由此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群体”,使其对新教的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

韦伯在研究中认识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天主教文化下,还存在其他许多种资本主义形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起因复杂多样,包括现代技术、理性管理、货币经济、市场需求、训练有素恪守纪律的劳动力以及自由的政治环境等,这些都是西方世界的城市所促成的。韦伯更加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与路德宗教和加尔文新教的世俗禁欲伦理相融合,从而赋予西方资本主义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特性质(特纳,1998:186)。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重视解释历史事实的“文化含义”,力图将某种发展过程、将混沌多样的现象、包括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原因、结果和作用归并为一种“理念的”、观念化的过程,试图在“混乱无序”中构建某种概念性的秩序。他一方面探讨研究对象的“理想型”,另一方面力图使之与“思想观念”相联系,包括某种“文化意向”、哲学或科学理论思想,形成一种“分析结构”(克斯勒,2000:219,221),由此建构其概念体系。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是人们从无意识的无限世界中,根据自己的观点而选取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有限片断”。他说,“经验性的现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化’,因为现实涉及到人的价值观念,包含着现实中那些对我们有价值的部分,而且事实上也只有这些部分才属于文化。”他提出,“我们所从事的社会科学,是一门现实的科学。我们力图按其自身的特点来理解我们周围的生活现实。一方面要把握各个现象形态的联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要探究它之所以是如此而不是如彼的历史原因。”(福根,2001:81-82)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加以探究,同时力图超越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纯粹的历史思考,去寻求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普遍关系模式,并强调此种关系模式中权力关系的重要性。

马克斯·韦伯说:“这些概念构成本身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科学所固有的,而且在某种范围内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思想图景把历史生活中的某些关系和过程都纳入到一种无矛盾的思想世界中,在内容上,这种概念构成有一种乌托邦的特点,它力图通过思想的升华来把握现实的要素。它与生活的经验事实的关系,是作为实际的或臆想的关系而存在于……现实的联系中的,我们可以借助于理想型而使这些联系的特点实际地、直观易懂地展示出来……这一理想型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前提’,但它可以为前提的构成指出方向。它也不是现实事物的展示,但它力图为这种展示提供一种清楚的表达手段。”他提出,“社会科学涉及人的精神过程的作用,在重新体验中理解这个过程,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任务,它完全不同于对精确的自然知识作形式化处理。”强调研究者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他说:“什么东西如果成了研究的对象,就会受到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福根,2001:83-84)例如,“‘国家至上’是我们最后的价值标准,从而也是我们考察国民经济的标准”(福根,2001:63)。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的内在文化和价值观,此种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构筑了他的官僚制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斯·韦伯毕生都在关心政治事务,称“政治”是他的“秘密情人”(韦伯,2009:英译者序,5)。在其官僚制研究中,政治关切贯穿始终。对于政治发展,韦伯断然否定经济发展会促使一个政治幼稚的民族自动走向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他认为,即便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这种政治本能通常也只是“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它必须通过“经济与政治领导阶层”得到自觉体现,因为,这种阶层理应承担一种特殊功能,“就是要成为民族政治目标感的担纲者,事实上,这是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的唯一政治理由”(Lassman & Speirs,1994:21)。面对俾斯麦的威权政治,韦伯预见到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缺少自由政治和价值关怀的大规模现代国家;“只是揣着大把来历不明或不雅的银子漫无头绪地得过且过”,“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入政治深渊”。他批评俾斯麦的统治“未能产生出一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未能给德意志民族提

供急需的政治教育”(韦伯,2009:中译者前言,4;英译者序,8-9)。警告他的同胞,寻求未来的出路最关键的并不是两眼紧盯着“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要不断拷问“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资格”(Lassman & Speirs,1994:26)。韦伯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人民在物质上的安乐,而是在任何特定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人类品质。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目的就是要培育“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Lassman & Speirs,1994:15)。他批评德国是个缺乏政治教育和政治意志的民族,认为那些不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家,他们“靠政治”为生,不是“为政治”而生,导致官员统治,不利于真正的政治领导权,不利于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生存,也不利于负责任的政府和对公众的政治教育。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领袖最终受到的约束,来自使他的天职有了方向的那些强有力的内在信念,它超越了任何粗鄙意义上的“权力意志”(韦伯,2009:英译者序,9、13)。

四、对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将官僚制等同于现代行政机构,同时背离以往带有贬义的指称,使之始终成为一个“中立性”的概念,这一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是韦伯对官僚制概念的界定导致了这一概念的混乱,并且对“理性官僚制”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①的批评。他在其“官僚制的结构与人格”(1940)一文中提出,强调行政中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很可能导致自我拆台。“统治,本来是被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它却可能自身就成为目的。官僚制的等级晋升阶梯,可以促使官员越出他被认为应当具备的德行——谨慎、守法、循规蹈矩——的界限。由相近的工作条件所决定,官员们形成了一种群体稳固性,它导致对必要变动的对抗。在要求官员服务于公众的地方,支配其行为的非人格化规章,却可能引起与公民个人的冲突。”(阿尔布罗,1990:43-44)默顿认为,韦伯视为理性的那种机构,极易产生出有碍于完成组织目标的意外结果。菲利普·赛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②的看法与默顿相类似,他们二人都认为,“韦伯概括的行政机构的正式规范,不足以描述官僚们实际上将如何行事。作为社会人,官僚的性格超出了行政法典的规定。如同其他人一样,他有利益、偏见和畏惧,并参与了朋友关系与团伙关系。”(阿尔布罗,1990:43-44)意即官僚机构及其官僚并不像韦伯所描述的那样超脱、理性和具有中立性。

批评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的一个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不能脱离组织所处的文化背景来对行政系统加以评价。德国杰出的法学家鲁道夫·斯曼德(Rudolf Smend)提出,韦伯对行政机构是理性机器即官员是技术职员这种错误概念负有责任。他认为,“法官与行政官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经受过文化熏陶,是社会人,他们的行动能够对文化统一体发挥作用。他们被文化统一体所限定,服从于它,反过来又对文化统一体的性质发生影响。”(阿尔布罗,1990:46)莱因哈特·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在其著述中谈及文化制约行政理性问题,提出,须同时考虑正式规章和人们对之的态度,否则无法评价组织效率。在其《美国社会中的高级文官》(1949)一书中,他驳斥了那种相信在没有一般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影响的情况下就能服从规章的看法。认为,所有规章都必然应用于某种特定情况,并且官员要做出哪种情况应由规章支配的判断。在做判断时,官员们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忠实地依从于条文规章,通常要被指责为官僚作风;过分地依赖于创造性地实现法规的精神而不只是其词句,通常又要被指责为滥用权力或干预立法权”(阿尔布罗,1990:46)。种种批评显现出人们试图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制的理论演绎走向经验性研究的趋势,一方面努力去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行政制度;另一方面继续寻求不同行政体制中的共同因素与特征。

需要认真加以探究的是,马克斯·韦伯到底试图通过他的理性官僚制理论说明什么。在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框架中,所谓“法理型权威”的合理性即合法性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目的和价值均在法典中得以阐述和体现;第二,法典的抽象规章被用于各种特别的情况,行政在其框架内追求利益;第三,

^① 罗伯特·K·默顿(1910—2003):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社会学家,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② 菲利普·赛尔兹尼克(1919—2010):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教授、社会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处于这一体制内的人的职责限定于一些特定的任务。其理性官僚制,既包含专业技术,也意味着法律专业知识。行政行为不仅受技术制约,也受规范指导。韦伯曾明确表示,技术包括可计算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但不足以达到组织的目的。他认为,德国官僚制中高度的道德水准,促进了它的优越性。他在与法国和美国加以比较时提出:“哪一种组织能达到最大的‘效率’呢?是更容易导致腐化的私人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即纯粹的企业职员制;还是在国家指导下要求高度道德与高度知识的权威主义之下的德国官吏制度?”(阿尔布罗,1990:54)很显然,依据韦伯的看法,是后者。韦伯并不把理性官僚制视为孤立的社会现象,事实是,他在关注官僚制的同时关注现代文化理论。他对官僚制的理论阐述之所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开阔的视野。马克斯·韦伯不是一个视野狭窄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相反,他跨学科和跨国比较的视野和洞察力使之在论述中并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抽取出现实和精髓,找寻出共同的特征和合理性,由此而建构其“官僚制”的理论框架。马克斯·韦伯特别强调,出于概念清晰性的考虑,理想类型不得不具有简化和夸张的经验事实。因此,在现实中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政府行政机构是严格的韦伯定义意义上的官僚制。

参考文献:

- [1] [英]马丁·阿尔布罗(1990). 官僚制. 阎布克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
- [2] [德]汉·诺·福根(2001). 马克斯·韦伯. 刘建军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3] [德]迪尔克·克斯勒(2000).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郭锋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 [4] [英]布赖恩·S. 特纳(1998). 探讨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附录五). 冯克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5] [德]马克斯·韦伯(198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6] [德]马克斯·韦伯(2009). 政治著作选. 阎克文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 [7] Gerth, H. H. (1964).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Collier and Macmillan.
- [8] Lassman, Peter & Ronald Speirs (1994).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Weber, Max (1948). Essays in Sociology. In 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eds.), London: Routledge and Regan Paul.

An Analysis on Max Weber's "Bureaucracy" Theory

Tan Rong (Professor,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Max Weber's study on bureaucracy theory stemmed from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ideology of European theoris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He adopted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proceeded from rationalism to build his theoretical model of "ideal bureaucracy". His research spans multiple areas with full of deep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in thought. Although Max Weber's bureaucracy theory is questioned by some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so far, no one can exceed his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bureaucracy, and his ideal bureaucracy theory model is still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n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both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Max Weber; ideal bureaucracy; rationalism

■作者简介:谭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Email: tanr@nankai.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7BZZ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11&ZD072)

■责任编辑:叶娟丽